

争做环保使者 共创绿色文明



历史上早期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诞生在南京——

南朝四馆：中国最早的“分科大学”

南朝宋文帝在南京设立四馆

2019年10月31日，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而15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馆就诞生在南京，南京也是为中国文学创立早期规范的城市。

据《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由唐代许嵩编撰的编年体史书《建康实录》也记述了此事：“立儒学于北郊，延雷次宗居之，辟人宫掖，乃自华林东阁入讲于延贤堂。明年，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集门徒，多就业者。”

也就是说，在元嘉十五年（438）前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设立四馆，由雷次宗主持“儒学馆”，何尚之主持“玄学馆”，何承天主持“史学馆”，谢元主持“文学馆”，四馆就各自的专业招收学生。

“宋文帝设四馆，与南朝的时代环境和他个人的文化素养有关系。”南京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南京出版社社长卢海鸣向记者讲述了四馆成立的背景和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江南地区相对安宁，东晋、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成为当时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南京文化在思想、宗教、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科技等领域，独领风骚，堪称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时期”。两汉以来儒学独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社会上形成了儒学、经学、玄学、道教、佛教等多种学术思潮并存的局面。著名美学家宗白华称这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著名学者胡小石称这是“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的黄金时代。”

宋文帝是宋武帝刘裕的第三子。刘裕出身寒门，但受到大族名士的影响，注重皇室教育。据《宋书》记载，宋文帝14岁时就已“博涉经史，善隶书”。在他统治时期，推行繁荣经济的各项政策，国力极为强盛，史称“元嘉之治”。在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之后，他也需要网罗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国家服务，于是创立四馆，以汇集来自全国各具特长的精英。

四名主持者在当时都是声名显赫的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溯介绍，根据史料记载，雷次宗年轻时入庐山，师事著名佛学大师慧远，是一名儒佛兼通的学者，齐高帝萧道成曾是他的学生；何尚之精于玄学，曾在建康南郭外的家中置学，四方士人慕名而来，谓之“南学”；何承天是著名的史学家、天文学家，他制定的《元嘉历》一直通行到梁天监中叶，在我国天文律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谢元则来自显赫的陈郡谢氏，为文学家谢灵运族弟。

四馆标志着分科教育制度的开始

四馆的设立，改变了我国自古以来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国文史研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近日，云集了江苏所有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暑期培训班在南京举办，省委书记信长星亲自到场讲了第一课。他与大家纵论古今，从中国最早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文学馆”“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在南京诞生谈起，指出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江苏在中华文化传播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引起热烈反响。那么四馆是如何诞生的？对江苏文化传承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南京北极阁的世界文学客厅

究专家王焕镪认为：“它标志着我国分科教育制度的开始，堪称我国最早的分科大学。”

儒学是东周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汉武帝为强化中央集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朝廷又设立“五经博士”，进而形成了专门的“经学”，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就以经学的形式存在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走向衰微，“但六朝的帝王和官僚贵族，大多既信佛教、道教，又尊儒学、玄学，由于儒学思想提倡的纲常礼教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使得儒学思想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卢海鸣说。

玄学的兴起与儒学的衰微相关。东汉末年，人才选拔为世家大族所左右，士子们出于对现实的失望，开始钻研“玄虚淡泊”的玄学。据《说江苏》记载，玄学发源于北方，经魏晋时期何晏注《论语》、王弼注《周易》《老子》的理论建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以“自然”反抗“名教”的行为实践，向秀、郭象注《庄

子》的思辨深化，又与道教、佛教相互借鉴，大大提高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水平。

玄学家还创造了生活美学，后世称为魏晋风度，他们好清谈饮酒、吃五石散、宽袍大袖、手持麈尾（拂尘），品鉴人物，欣赏山水，出语隽永，矜持清高。玄学的思辨、对自然之道的探求，对南朝文学艺术如玄言诗、山水诗、山水画、书法、文学理论、书画音乐理论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先秦以来，文、史、哲都是不分家的，四馆的设立，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史、哲的不同特性。史学，尤其是文学摆脱了对经学的依附地位，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

胡小石在《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阐述了文学独立的重要意义：“此次开四馆，可为世界分科大学之最早者。而以文学（诗赋）与儒学（经学）并列，又为文学地位增高之新记录。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赋进士，有同等重要。”

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赵

益认为，“文学馆的设立和其他一系列事件的联系，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所谓文学的自觉，南京为什么成为文学之都，这是原因之一。”

形成文学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

宋明帝时，设总明观，分儒学、道学、史学、文学、阴阳学五部，沿袭了宋文帝时的分科教育传统。分科措施促进了六朝时期各科的发展，其中，史学和文学取得的成就尤为辉煌。

南朝的史学成就很高，“二十四史”中就有三部是南朝人的作品。宋文帝时期的大史学家范晔撰写的《后汉书》，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誉为“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他还创立了《列女传》《逸民传》《方术传》等新例，首次将女性、隐士、方士等社会边缘人物载入史册。沈约是南朝大文学家，奉诏于南齐永明年间编写了《宋书》；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在梁代修撰《南齐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前朝帝王子孙撰写的正史。

据《说江苏》记载，三部正史之外，还有东晋著作郎干宝撰写的编年体国史《晋纪》，南齐时京口（今镇江）隐士臧荣绪撰写的《晋书》等。南朝人还开创了一些新的史学方法，比如刘宋元嘉年间裴松之奉诏为陈寿《三国志》作注，补充了大量史料，创新了史书的注解方式，后南朝宋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也采用了这个方法。

六朝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卢海鸣认为在诗词歌赋方面，六朝题材大为拓展，由汉赋一统天下发展成为多种文体并存。东晋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鲍照的边塞诗和杂体诗等等，无不是光芒万丈，千古传唱。在诗词声律方面，沈约、谢朓等人开创了“永明体”诗风，为后来唐代格律诗的成熟和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刻画细腻，文笔隽永，后世多有仿作，但无出其右。

南朝的文学理论也极一时之盛。梁代钟嵘，著名文学批评家，其诗歌评论专著《诗品》，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诗歌品评标准。梁代刘勰用骈文创作的文学巨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最早一部博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

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文学作品选集《文选》，其中以赋为文学，将五经、诸子、史书拒于文学之外，首次为文学和非文学之间划定了界限和范畴，这是文学创作和理论发达之后，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

正是由于文学的独立，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兼容并蓄，荟萃精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

1000多年前播下的文学种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今天，南京已成为世界“文学之都”。2022年4月，在北极阁（古鸡笼山）下，南京“世界文学客厅”正式对外开放。而就在这两天，40余位中国作家和来自24个国家的32位汉学家齐聚这座城市，围绕“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主题，畅所欲言，南京这座城市，在世界坐标系中，又增添了一份全球视野。

江苏学者解读中国碑刻三千年



南京三绝碑

□ 本报记者 于锋

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碑刻石刻文物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记录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历史信息。由江南大学教授、无锡市历史学会副会长金其桢历时30多年，精心编撰的《中国碑刻研究通论》近日出版。此书以1300幅碑刻图版，从碑刻史论、碑刻文化专题论、珍奇碑刻考探3个角度构建中国碑刻文化，全面展现中国碑刻起源、发展、演变的基本图景。

“历代碑刻苍范如林，源远流长，是一部记载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包罗万象的石质百科全书。”金其桢教授如此解读碑刻对中华文化的关键作用。这位196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的知名学者从青年时代就和碑刻结下不解之缘。

在金其桢看来，如果对中国历代碑刻的研究、了解，仅仅局限于书法艺术和文字考订上，那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将碑刻文化置于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发展的宏观大背景、大氛围下，从单一到综合、从微观到宏观、从表象到内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海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考察，才能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一条中国碑刻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那时起，金其桢就立下创作一部中国碑刻三千年“专史”的宏愿。数十年来，他不辞辛劳，一点一滴地积累关于历代碑刻的资料。他还大力吸纳考古界、史学界在碑刻发掘、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书中收录各地新发现的碑刻，如去年6月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新发现的8通清代碑刻，就被他及时收入书中。在四川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金其桢终于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206万字、1300余幅图版的《中国碑刻研究通论》。

《中国碑刻研究通论》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为《中国碑刻史》，展现了中国碑刻自春秋时期萌生以来的三千年岁月中的，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历程历代演变的进程；第二卷为《中国碑刻与中国文化》，通过覆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字语言、中医中药、天文地理、水文水利、教育科举、法制史等20个专题，全方位多层次深入系统剖析揭示了碑刻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宏大文化内涵、广泛多样的功能和作用；第三卷为《中国历代珍奇碑刻考探》，深入探析、论述中国历代所出现的各种珍奇碑刻，阐述它们在文字、文体、碑材、碑文内容、镌刻技艺、制作方法、外观形态、碑石形制、功能用途及撰书者身份等方面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其中绝大部分碑刻都在第三卷中有所介绍。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祥认为，《中国碑刻研究通论》三大卷，“纵则贯通、横则全面，在纵横驰骋之余，殿以拓荒掘深、趣味盎然的珍奇碑刻，使得‘通’之旨趣越发彰显，‘论’之细密益形显著，‘研究’意味更加浓郁。”江苏知名文史专家、徐州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田秉铎将《中国碑刻研究通论》称为“江苏学界的时代成果”。

江苏成语故事

封坛退鲜(zhǎ)

陶侃是东晋有名的贤臣，从小就勤奋好学，人品极好。年轻的时候，他在浔阳县衙里当过一个主管渔业的小官。平时忠于职守，兢兢业业。

有一次，部下见他生活清苦，就从鱼池里捞出一坛鲜鱼给他食用。鲜鱼类似于现在的腌鱼，也不是什么珍贵值钱的东西。陶侃想起独自一人的母亲湛氏过着清贫的生活，充满内疚。便趁同事出差都阳之机，顺便捎上这坛腌鱼，并附上告安信，以表孝心。

陶母收到信物，非常高兴。随口问送信物之人：“这坛鱼，在浔阳要花多少钱？”那同事不解其意，直夸耀说：“这坛鱼不用花钱买，去下面作坊里拿就是，伯母爱吃，下次我再给您多带几坛来。”

陶母脸色大变，将坛子封上退回，并修书一封责备陶侃：“你身为官吏，怎么能把官家的东西给我。这非但不能对我有什么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这就是“封坛退鲜”的典故。陶侃时刻牢记母亲的教训，后来，他由一个小官吏，逐步升迁为武昌太守、荆州刺史，都督江汉军事，但他总是克制自己，廉洁奉公。从湛氏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

铜牛、雁足、龟钮……

这些动物文物，在古代有怎样的寓意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近日，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介绍了上世纪80年代江苏省邗江县甘泉镇一座东汉初年墓（甘泉二号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包括错银铜牛灯、雁足灯、龟钮“广陵王玺”金印等。在古代墓葬出土的器具中，不少是动物造型，那么这些文物到底有什么寓意呢？

错银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3部分组成。灯座为一头呈站姿的黄牛，腹部是空心的，油烟可通过烟管溶入牛腹部的水中，确保室内空气不受污染。

“在现代看来，牛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代名词，而在古代则具有不同的寓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惠靖解读了古代文化中牛的文化内涵。

在古代的占卜、祭祀等宗教性质的仪式中，牛是主要的祭品，扮演沟通天地的角色。中国祭祀等级，按照等级从高到低是太牢、少牢等，太牢就是牛、羊、豕三牲全备，少牢只用羊、豕二牲，可见牛的地位。贵族祭祀用的礼器“尊”，以牛的造型更彰显对祭祀活动的敬重。

据《礼记》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西周时期，诸侯都不能无故杀牛。春秋诸侯订立盟约，要割牛耳歃血，由主盟国的代表拿着盛牛耳朵的盘子，因此称为“执牛耳”。

这件错银铜牛灯不仅设计巧妙，灯身上的纹饰也十分精美，以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为底，饰龙、凤、虎、鹿等神异灵兽图案。夏惠靖认

为这是古人对王权、神权文化思考的体现。相对铜牛灯设计的复杂，雁足灯则比较简约。灯的柱和座制成雁足形，上方有两个灯盘，都近似圆形。

雁在古人心中同样有多重含义。镇江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书敏告诉记者，雁飞行时排成“一”字形，象征长幼有序、礼让恭谦，所以称为“雁序”；雁的雌雄伴侣从一而终，象征对爱情的忠贞。“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就是元好问被大雁殉情而死所感动而作的词。同时雁南来北往，顺乎阴阳，象征夫妻阴阳和顺，所以在婚姻礼仪中发挥重要作用。

“鸿雁传书”的传说也广为流传，这是出自《汉书·苏武传》：“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这个故事带有神话色彩，但可见那时人们已经认为雁有传书的作用，雁足也成为书信的象征，如果进一步延伸，可代表对亲人、故乡的思念。因此，雁足灯也常常出现在汉代诸侯王的墓葬中。

“广陵王玺”金印为龟钮形，这是汉代官印中最常见的钮制。

据《礼记·礼运》记载：“麟体厚，凤知治乱，龟兆吉凶，龙能变化。”先民认为龟具有预知凶吉的神秘能力，因此以龟甲来占卜。周王朝在宫中设立龟官，官名称“龟人”，掌藏龟以备占卜之用。“正是这种特性，汉代朝廷把龟和皇权直接融为一体，将龟的形象纳入官印体制。”夏惠靖说。

龟钮也分级别，列侯、丞相、太尉为黄金印

龟钮，年俸2000石以上官吏为银印龟钮。墓中出土这件为金印龟钮，可见墓主地位之高。

这几件文物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据扬州博物馆馆长束家平介绍，雁足灯为1980年发现，上刻有“山阳郡铜雁足灯建武二十八年造比十二”17字铭文，但据此并不能确定墓主身份。到了1981年，一村民在这座墓附近偶然捡到“广陵王玺”，结合“山阳郡”“建武”（汉光武帝刘秀年号）“广陵王”等信息，最终确定墓主人为广陵王刘荆。

刘荆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光武帝去世后，刘荆同母兄长刘庄继位，刘荆不愿只做一诸侯王，策划谋反却没有成功，刘庄将他贬为广陵王。此后刘荆多次谋反未成，公元67年，终畏罪自杀。

这枚金印的出现还解决了一件在日本争论了200年的悬案。1784年，日本一名农民捡到一方形印章，底部刻着“汉委（委通倭）奴国王”5个字。日本的学者龟井南溟在查阅《后汉书》后发现：“建武中元二年（57），倭国曾奉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推断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当年倭国人在汉朝朝拜时，光武帝赏赐的印玺，但很多日本人认为这枚金印是假的。

“广陵王玺”金印出土后，专家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与“广陵王玺”金印的形状、花纹、大小、材质如出一辙，都属于汉代金印的制作方法。这些研究结果证明，“汉委奴国王”金印是真的，也证明了早在东汉时期，中日两国就有了来往。



错银铜牛灯



龟钮“广陵王玺”金印



雁足灯